

# 第二轮中国 - 非洲 - 美国三方 首次对话会纪要

刘海方\*

2010年 2月 24~ 25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南非布伦瑟斯特基金会 (the Brenthurst Foundation)、美国外交学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和美国苏利文基金会 (Leon H. Sullivan Foundation) 联合开启第二轮“中国 - 非洲 - 美国三方对话会”。来自三方的 30余位代表聚会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 参与这轮对话会首次会议, 其主题为“企业社会责任与全球苏利文原则——大公司在非洲发展中的作用”。

## 访问和对话会的基本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以西亚非洲研究所杨光所长为团长, 成员包括该院国际合作局周云帆局长助理和西亚非洲所刘海方博士, 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国家风险分析师赵昌会博士、中非发展基金研发部副经理蔡金牛博士和中国河南国际合作集团驻利比里亚公司副总经理刘善亮。上述中方人员参加了此次对话会。

代表团一行于当地时间 2月 21日晚间抵达蒙罗维亚。翌日, 在中国驻利比里亚大使周欲晓、大使馆政治处主任高会君、河南国际合作集团驻利比里亚公司副总经理刘善亮等陪同下, 代表团参观访问了中国在 20世纪 80年代援建、2006年修复的体育场 (SKD)、中国援助的竹编项目工厂、体育场周围的蔬菜试种项目、中国援助利比里亚大学芬德尔校区的修复和扩建工程、著名华商胡介国先生的在建饭店项目、河南国际合作集团正在第二大城市布坎南木棉镇施工的 15公里道路项目, 以及海南千里投资有限公司项目。代表团重点了解了中国公司对于利比里亚战后重建和发展的贡献, 尤其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业绩。

2月 23日, 代表团访问了中国第九批赴利比里亚维和运输大队, 并与其部分军官举行了座谈会, 了解了该运输大队官兵克服种种困难完成运输任务、并利用与外军接触多的有利条件, 积极开展维和外交, 向利比里亚人民, 以及联利团其他国家维和部队官兵传播中华文明, 展示中国军队光辉形象的情况。同日, 代表团到中国大使馆座谈。应周大使的邀请, 杨光所长就非洲形势及对中非关系热点问题的看法作报告。杨光所长全面报告了非洲当前政治稳定、经济中速增长、国际社会重视程度提高的总体局势, 介绍了国内学者及自己对于这些表象背后原因及走势的分析与判断。关于中非关系, 杨光所长主要谈到了怎样认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面临的挑战等。大使馆工作人员认为, 杨光所长的报告对他们的外交工作具有总体性指导意义。

2月 24~ 25日, 三方对话会正式举行。参加对话会的有官员、专家和学者, 也有各方在非洲公司的代表。卢旺达菲纳银行、非洲跨国资源集团 (TransAfrica Resources Group)、毕马威国际会计公司斯威士兰分公司 (KPMG Swaziland) 和美国的谢夫隆公司 (Chevron Nigeria Ltd.)、马拉松石油公司 (Marathon Oil Company)、可口可乐公司都派出了专门负责企业社会责任或社区关系的高级顾问、经理或有关人士与会。对话会气氛热烈、友好, 代表们讨论踊跃。

---

\*本文整理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

## 对话各方的主要观点

时隔两年多,尤其是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政治、经济、甚至在社会、文化领域的种种变动后,参加此轮对话的各方代表都带着危机过后的诸多反思和期盼,就与非洲发展相关的企业社会责任话题展开讨论,并交流各自的经验。杨光研究员在开幕词中指出,金融危机为下一轮的长期增长带来了新机遇,关注企业投资和履行社会职责问题恰逢其时。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前驻南非和尼日利亚大使普林斯顿·莱曼(Princeton Lyman)在会议开幕词中也说,这是机会和责任的双重时刻,也是研究各国政策和私营部门投资怎样成为非洲发展之乘的时刻。<sup>1</sup>南非布兰瑟斯特基金会主任格雷格·米尔斯(Greg Mills)也在开幕词中指出,本次会议的意义是在非洲讨论促进非洲的发展问题。

与会各方的发言主要围绕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作用、涵盖的内容,以及各公司的实践经验展开。

### (一) 三方代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有相似的理解

杨光研究员认为,在非洲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仅有利于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履行社会责任,不是企业的净付出,而是能够创造有利于企业经营的环境。卢旺达菲纳银行的斯蒂夫·卡雷(Steve Caley)强调,菲纳银行将道德意识与当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结合在一起,积极参与卢旺达社会“重建与发展”计划。赵昌会博士强调,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理念。蔡金牛博士详细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指出这是中非基金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即高度关注对非洲经济发展具有“造血”功能的行业和领域,在规划项目的同时将中国先进适用的工业技术带到非洲,积极促进当地机械制造业的发展,推动非洲国家工业化进程。中非基金的投资领域已遍及非洲国家基础设施、能源、交通和基础制造业。中非基金在埃塞俄比亚投资的玻璃厂结束了该国不能生产玻璃的历史。可口可乐非洲公司的菲利普·艾伊沃(Philippe Ayivor)强调,可持续发展是该公司赖以生存的根本,没有良好的商业环境,就不会再有生意可作。

### (二) 三方代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所持的观点视角各异

中方代表特别强调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因素,认为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赵昌会博士指出,“企业社会责任”一词在中国貌似新鲜舶来品,是在西方语境中创造的,但实际上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价值观体现。杨光研究员认为,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而在中国呈现方兴未艾之势,其根基之一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观念,都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商业道德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儒商”,就是指遵从这些商业道德的商人。非洲一些代表认为,非洲国家应当制定某种普遍的标准或原则。卸任不久的加纳第四任总统、现任苏利文基金会(Sullivan Foundation)董事约翰·库福尔(John Kufuor)认为,尽管国际上已有一些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原则,但应该制定非洲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准则。德比尔斯博茨瓦纳公司执行总裁卡玛(Sheik Khama)女士认为,应该对各国投资者制定统一的商业准入原则,这种原则应包括延长非洲资源在本地的价值链和提高透明度。但非洲联盟原副主席帕特里克·马兹姆哈卡强调,制定标准不应当是通过这样的对话会,而应通过非洲联盟。他认为,非洲各国、各地区的具体条件千差万别,也许达成在全非洲范围的统一标准是不可能的。美国代表强调“自愿原则”,不愿看到建立任何非洲标准。苏利文基金会高级顾问惠特尼·施奈德曼(Witney Schneidman)强调,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企业社会责任应是公司自愿遵从的准则。谢夫隆公司代表弗莱明(Dennis Fleming)认为,非洲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制定一套泛非企业社会责任原则没有什么可行性。

### (三) 三方代表就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各抒己见

<sup>1</sup> See Richard Stengel "For American Consumers a Responsibility Revolution", *Time Magazine*, Sep. 10 2009, [http://www.time.com/time/nation/article/0,8599,1921444\\_00.htm#ixzz0HHY8JuYf](http://www.time.com/time/nation/article/0,8599,1921444_00.htm#ixzz0HHY8JuYf)

应邀与会的利比里亚总统瑟立夫在演讲中认为, 总体而言, 没有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担当, 就不能有真正的发展; 具体而言, 企业社会责任意味着尊重劳工权益、保证最低工资、不使用强迫性劳动合同工、尊重环境、尊重性别差异和两性平等权利等。赵昌会博士阐述了进出口银行对企业的7项要求, 即遵守当地法律, 提供正当的产品和服务, 经济上有益于当地民生, 行为端正, 促进社会平等公正, 促进当地发展, 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理念。美国阿米利卡 (America) 教授认为, 大致而言, 企业社会责任涵盖5种情况, (1) 宣传公司的形象; (2) 促进与东道国、地区友好关系的形成; (3) 根据合同的要求履行责任; (4) 提升产品品牌; (5) 促进当地社会发展。谢夫隆公司顾问弗莱明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手段和一种灵活地反映地方具体条件、企业运营环境和相关者利益的经营方式。对于一个具体企业而言, 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是变化演进的, 并根据具体条件和当地的期待而进行调整。刘海方博士指出,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 还有两个具体内容不该被忽视。(1) 技术转让。它是一种主动地将企业母国已充分掌握的技术传播到东道国的行为, 是真正使当地人民长远受益的贡献。中国周恩来总理早在1963~1964年访问非洲时, 就提出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 把技术转让作为向非洲当地社会承担的责任。中非合作至今还经常被称为“经济技术合作”。(2) “社会凝聚力”。由于历史原因, 民族国家内部缺乏社会凝聚力可能是阻碍非洲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长时段因素。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 应包括提高非洲国家的社会凝聚力。

#### (四)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业绩, 中方代表的发言成为亮点

杨光研究员在发言中以实例和数据说明,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研究人员几次在非洲实地调研, 在非洲的中资企业总体上表现良好, 在劳动力本地化、改善基础设施、改善教育和医疗条件, 保护当地环境方面, 都作出了显著贡献。但中资企业一般奉行“多做少说”或“只做不说”的原则, “宣传”技巧远不如西方跨国公司。对中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业绩, 应当扩大宣传。

来自中非发展基金、中国进出口银行和河南国际合作集团驻利比里亚公司的三位中方代表各自讲述了本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贡献, 引起了与会各方代表的广泛兴趣, 提问互动环节显得异常活跃。蔡金牛博士介绍了中非发展基金在马拉维和莫桑比克的棉花种植项目带动当地农户就业的情况, 还介绍了该基金在非洲的首个项目——加纳的电厂项目。刘善亮副总经理以鲜活案例介绍了该公司在利比里亚承建机场公路的情况, 以及该公司雇用当地劳工、提供技术培训、避免破坏环境、向社区活动提供捐助, 也谈及该公司举行艾滋病防治宣传等方面的情况。周欲晓大使在当天的演讲时高度赞扬了在利比里亚的中资公司的表现, 并概括为“积极反映、高效率、热心支持、考虑周到、低成本和透明运作”等特点, 强调正是这种行动型、追求结果的特点和品质, 使中国公司在利比里亚战后重建和发展中作出了“积极且可感知”的贡献。

相比之下, 美国的谢夫隆、马拉松、可口可乐等公司的经验介绍显得缺乏新意, 反响平淡。毕马威国际会计公司斯威士兰分公司、卢旺达菲纳银行、非洲跨国资源集团等来自非洲的公司因为基本上都有西方背景、抑或直接就是西方跨国公司的分支, 在实践方面并没有体现出鲜明的非洲特色。

#### (五) 关于中非关系, 非洲又出“向东看”研究成果

近年来, 非洲出现“向东看”动向, 强调学习中国发展的经验, 促进非洲经济发展。在这次对话会上, 非洲经济转型研究中心 (African Center for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CET) 所长布朗博士 (Dr. Edward Brown) 向与会者报告了该中心最近完成的研究报告《向东看: 中国进入非洲的收益与挑战》 (“Looking East: China’s Engagement with Africa: Benefits and Key Challenges”)。该报告指出, 直接投资是中国对非洲贡献最大的领域, 为非洲创造了就业机会、带来了技术转移等收益; 而中国对非洲采取的优惠市场准入政策, 可促进非洲贸易转型和多元化发展。报告建议非洲各国制定中长期和积极的对华策略,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利用中国有利的对非洲政策, 以中国各大城市为平台, 解决非洲商品普遍面临的市场进入问题; 大规模削减财政赤字, 重点改善宏观经济环境, 把贷款数额限制在可持续数额内, 减小大规模举债带来的风险; 希望在下届中非合作论坛上, 不仅是中方提出对非洲合作计划, 而且是双方共同拟定各种动议。报告也指出中非合作中的一些问题, 但基调积极, 具有建设性, 论述比较客观, 尤其是对中国与非洲“经济技术合作”的解释, 有助于与会者加深对中非南南合作性质的理解。对于这个研究报告, 各方代表

没有发表异议。

## 出访和对话的体会

与会三方代表普遍认为，本次会议是非常成功和非常有意义的，如杨光研究员强调，这样的经验交流会议是非常好的，一方面促成更好、更全面地互相了解；另一方面，各方都可以学到其他方面有用的经验，也了解到彼此的关切，从而用于改善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作为。格雷格·米尔斯在闭幕词中也指出，会议成功之处在于充分交流各方的经验和看法，这样的交流还应继续并深入开展。在企业社会责任已经蔚为大观、俨然有产业化趋势的今天，通过交流，我们认识到来到非洲的中国、美国的公司，各自有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和承担方式。

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说，这尤其是一次富有成果的对话和访问，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宣传中国价值观，增强中方话语权。在此次对话会上，中方学者摆事实，充分阐述中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业绩；讲道理，突出强调中国的优秀传统价值观，对美国和非州的与会者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会议上，与会者多次表示，虽然听到了“谢夫隆方式”、“可口可乐体系”等，更听到了中国代表们积极地讲述和交流关于中国公司具有文化传统底蕴的企业社会责任模式。莱曼大使在总结发言中强调，在非洲的中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业绩，远远超过了美国人的了解。施耐德曼在发言中说，很高兴学习到中国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有千百年以前的传统价值观念作基础。尽管中美两种文化、两种社会制度之间有巨大差异，但在什么是发展、怎样促进发展的问题上，双方还是能够找到共同语言来达成理解的。莫桑比克前总理路易莎·迪奥戈·迪亚斯（Luísa Diogo Dias）说，自己历任部长、总理多年，没有听说过“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更不知道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对此具有如此深厚的价值观基础。最后，多位非洲代表表达了对于中国的价值观、政府政策和公司表现的赞赏。

通过这次经历，与会代表感到，其他国家对于中国在非洲的正面影响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当然有西方媒体负面报道太多这一背景，但是也与中国人自己习惯的“多做少说，甚至多做不说”、“低调行事”的习惯有直接关系。中国政府、中国公司需要学会自己“广而告之”。实际上，本次会议中，美国的大公司也承认自己面对两难的问题，即如果不说，当地人就认为你什么也没有做；如果说了，往往又会被指认为是搞宣传。即便如此，自己主动说，总是比被动地受到指责后再去解释要好一些。

2. 进行实地考察，收集到第一手资料。代表团成员以前都没有去过利比里亚。在对话会上，我们能够直接与一大批非洲的政要和专家学者接触，了解他们对中非关系的最新看法，也了解了西方学者和企业对履行社会责任的理解与实践；在会外，能够对这个极度贫困和面临战后重建的挑战、且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国家进行多方面考察；能够直接听到周大使，以及中资企业对发展中非关系的独到见解，更亲眼目睹了为战后利比里亚担任维和任务的中国的“北疆铁骑兵”，这些都使我们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受益匪浅。这些资料和信息对于我们深化研究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非洲与我国距离遥远，交通联系不便，形势变化很快。我国在非洲的利益不断扩展，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作为非洲问题研究人员，只有经常“走出去”，才能跟得上非洲形势的发展，才能更好地解决作品与实际对非洲工作需要“两张皮”的尴尬，发挥好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

3. 捕捉新动向，发现新课题。通过参加对话会和实地考察交流，我们发现中非关系有一些新动向值得关注。例如，一些非洲国家代表寻求制定针对外国企业的统一标准和原则，其背景相当复杂。又如，非洲学者提出，在下届中非合作论坛上，非洲国家应更多参与合作计划的制定等。这些新动向均关系到中非关系的未来，甚至关系到中国与大国的关系调整，应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予以关注。

（责任编辑：徐拓 责任校对：成红）